

批判卜凱的技術改良主義的反動性

應 廉 耕

披着教授外衣的美國人卜凱(J. L. Buck),長期以來(1920—1944)在中國利用着前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和美國財政部視察員名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勾結在一起進行着盜竊我國經濟情報的特務勾當,同時還利用其教授身份系統地販賣反動的資產階級農業經濟理論毒害和迷惑我國學者和青年。卜凱的這種反動理論,貫串在他所主編的,並在解放前流行的一些書刊如中國農家經濟、中國土地利用、中國農場管理學等之中,在當時目的在維護反動統治的“農村改良運動”諸派別中,卜凱是以搞農村調查並提倡農業技術改良的面貌出現的,所以把他歸屬反動的資產階級技術改良主義派的範疇。資產階級農業技術改良派實質上是和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派、晏陽初的平民教育派等沒有兩樣,都是在維護封建地主利益,維護反動統治政權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服務的。但由於卜凱採取十分隱蔽的手法,視而不見,避而不談農村中的封建剝削的生產關係,只談一些在原有小農經濟經營方式的基礎上進行農業技術改良,強調所謂調查研究統計分析等的一套辦法,模糊讀者的觀點,使讀者得到一個假象,似乎卜凱根據實際材料,所談的只是農業經濟中的一些技術性的問題,便很容易忽視其反動的實質。卜凱難道真的只是在搞一些技術改良,通過調查研究來解決舊中國農業生產上的一些實際問題麼?難道真的沒有考慮到舊中國農村封建半封建的剝削關係如他在“中國土地利用”一書中所說:“本調查對於農民與其他社會階級間之政治、經濟及社會關係,即所謂農民狀況,不冀詳細評述”麼?(卜凱,中國土地利用,第一頁)完全不是那樣。我們知道,農業經濟學是社會科學,有着強烈階級性的科學,以卜凱這樣的帝國主義代言人並進行着經濟特務勾當的所謂“學者”,他對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絕對不是如其所說的不問“政治經濟及社會關係”,恰恰相反,在他所主持下完成的各種調查研究,是徹頭徹尾貫串着反動的立場觀點方法的,歪曲真象,故作種種謬論,目的在掩蓋舊中國農村封建半封建土地關係剝削實質。正因為這樣,反動的農業技術改良派不僅在舊中國曾經毒害過我國很多學者和青年,並且在解放後還繼續或多或少地迷惑着部分立場不穩認識不清的舊社會來的農業工作者,他們還認為其中有可以採取的地方,特別在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後,這株毒草又有“返青”的趨勢。為此,作者認為有必要對卜凱的技術改良主義的反動本質進行徹底的揭露和批判,這不僅是必

要的而且是及時的。卜凱的反動技術改良主義包括很多方面,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文僅批判其幾個主要方面的問題。

第一,卜凱對舊中國土地問題的看法。卜凱在研究舊中國土地問題時,表面上按照對土地占有情況分成自耕農、半自耕農及佃農三類,但這樣的分組實質上完全不能反映農村的真真階級關係,因為這樣的分組不能反映出每個人占有土地數量情況。譬如在自耕農一組裏,只要是“耕種已有田場的場主”便皆屬之,這裏面既可以包括貧農,也可以包括中農、富農、以至經營地主都在內,這樣便混淆了舊中國的農村階級關係。又在這個分類中有租用土地的人,但沒有出租土地的人,這些佃農、半自耕農所租用的土地是從何而來的呢?原來卜凱爲了掩蓋地主階級的剝削,除了利用上述的分組法來混淆階級關係外,還有意識的把占舊中國農村人口極少數但却占有着大量土地,不勞而獲的,而靠出租土地剝削爲生的地主階級沒有列入調查研究對象之內;另一面,受地主富農剝削最深的,既沒有土地,也無法獲得土地的僱農也沒有包括在研究對象之內。

由於卜凱這一系列的手法,他便得出結論:“佃農僅占百分之十七”,“是故中國佃農問題並不普遍”。(卜凱、中國土地利用,第9頁)舊中國農村封建半封建的面貌真是這樣的麼?這是他有意歪曲的結果,由於他沒有將僱農包括在研究對象內,由於他將絕大部分貧農中農劃入半自耕農和自耕農範疇內,餘下的所謂“祇有租種田地的場主”當然很少了,少到在其所調查的很多地區如安徽、山西、河北、河南等省可以近於或等於零。他就用這種手法,掩蓋了舊中國農村,“占鄉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農、占有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貧農、僱農、中農及其他人民,却總共只占有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劉少奇、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真實情況。

不僅如此,卜凱還進一步的公然來爲地主階級辯護,他宣稱:“租佃制度並不如吾人所常想即爲壞事,通常爲獲得農場所有權之必需步驟”。(卜凱、中國農場管理學,第106頁)卜凱認爲租額是租佃問題中最根本的問題,如果“合理”的租額確定了,地主與佃農就可以在“合作”“互惠”的基礎上進行技術改良,兩者“均獲巨利”。所以他巧立了“公允田租”的辦法來掩蓋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本質。他說:“我們對於地主方面,希望他能根據自己土地房屋的投資,得到相當的利息,對於佃農方面,希望他能藉着自己的勞力能得到相當的報酬。”(卜凱,中國農家經濟,第214頁)因之,“地主與佃戶,對於佃額的規定,猶如資本家與勞動者,對於工資的多寡的磋商一樣。”(卜凱,中國農家經濟,第217頁)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卜凱的這一套辦法是根據資本主義的地租形態,而有意忽視中國的地權還保持着社會的特權的性質。在封建半封建的土地關係的舊中國社會裏,地租的高度,實際上並不是根據資本主義地租形態或一般的借貸利率,像卜凱所說的:

“農人借貸的利率，平常每月都要二、三分，甚至還要比這個高些。若拿地主投資得來的利息，和農人借貸的利率比較，地主的收入真不算高。”（卜凱，中國農家經濟，第 210 頁），而是根據於佃農對土地的依附關係來決定的。舊中國時代由於工業落後，農民離開土地就無法生存，所以農民實際上是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列寧寫道：“封建制度是建立在農業生活方式和自然經濟底統治上面；中國農民所受的封建剝削底源泉，是他們之以這種或那種形式束縛於土地。”（列寧斯大林論中國，第 27 頁，人民出版社）舊中國封建半封建的剝削形態與封建時代對農奴的剝削形態是相同的，超經濟的強制在這裏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再說，農民們所繳納的地租和償付的高利貸均是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僅是不同形式而已，將二者加以比較來說明何者較輕何者較重是絲毫沒有意義的，況且高利貸也決不止二、三分，封建地主剝削更是占有農民生產出來產品一半以上，它不僅包括農民的剩餘勞動，而且還包括了農民必要勞動在內。

這裏還必須指出，卜凱之所以千方百計的為封建剝削掩蓋和辯護，目的非常明確，就是因為他所服務的帝國主義勢力要侵入舊中國農村，便必須和封建統治階級勾結起來，以便共同對付廣大農民，卜凱的一些手法不過是整個帝國主義侵略舊中國的一個環節而已。

第二，卜凱對農業經營的看法。卜凱為了能使舊中國農村封建關係繼續存在下去，就必然要提出“小農經濟穩固論”的反動學說來。我們知道小農經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有商品資本主義趨勢而不斷分化着，其中有極少數可能上升為富農地主，但另一方面則大部分農民失去土地而下降為貧農、雇農。卜凱稱讚這種廣大農民分化貧困的道路，稱之為“農業階梯”，為“獲得農場所有權之必須步驟”，用來欺騙廣大勞動農民，使農民相信所以窮困只是因為自己力不能及，以掩飾由於地主、富農階級的剝削造成農民貧苦的實質。卜凱提倡所謂“家庭經濟單位農場”，認為：“通常情形之下，家庭農場乃效率最高最經濟之農場”。（卜凱、中國農場管理學，第 50 頁）正是由於這種“家庭農場”的存在，才能在舊中國農村中存在着大批廉價勞動力來供地主富農的剝削。

在反動派統治時代，倡言小農經濟“穩固”論者實在不乏其人，到底是些什麼人呢，如國民黨反動派的骨幹分子、鄉村建設派、平民教育派、合作學派等等，他們都是以鞏固既存社會制度和既存反動政權為目的，主張維護和發展小土地所有制以對抗當時正在蓬勃發展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農民運動，對抗工農革命以維護反動國民黨政權。卜凱則企圖引用虛偽的數字來支持這些改良派的反動理論。他們的反動實質都是一樣的。

列寧斯大林以其精闢的見解徹底揭穿了這一反科學的小農經濟“穩固”論的實質。“不難了解：這種‘穩固性’是比任何不穩固性都要壞些的。不難了解：這個反馬克思主

義的理論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讚美和鞏固資本主義制度。”（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 446 頁，人民出版社，1953 年版）列寧在許多有關土地問題的著作中研究了丹麥、德國、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的統計材料曾得出結論說，“這樣，我們知道，無論在工業中和農業中，資本主義底基本的和主要的趨勢，就是大生產排擠小生產。可是，不能將這種排擠祇了解為立即的剝奪，凡是小土地占有者經濟破產和惡化的過程遷延好幾年和幾十年的，這也都是受排擠的結果。這種惡化的表現，就是小土地占有者底過度勞動，他們飲食底惡化，他們的債務底繁重，牲畜飼料和其他一般照料底惡化，土地的耕作、施肥等等條件底惡化，經濟技術底停滯等等。”（列寧全集，俄文版，第 17 卷，第 619 頁）由此證明小農經濟“穩固”論是虛偽的和反動的，它違反了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屬於唯心主義的範疇的。散漫的落後的小農經濟不但沒有什麼優越可言，同時也不能夠希望它保持“穩固”而不論落滅亡。斯大林同志認為即使資本主義大農場也要勝過小農經濟。蘇聯和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過程中，更證明了大規模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農畜產品生產率是比散漫的小農生產要高得多，充分顯示出社會主義集體勞動的大生產具有無比的優越性，這是技術改良主義者所夢想不到的一個事實。

第三，卜凱提出的改良中國農業技術的後面隱藏着什麼呢？卜凱在維持和保護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前提下提出了一點一滴的所謂技術改良，希望通過這些改良來緩和舊中國的農村階級矛盾，同時也是宣傳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方式，來為帝國主義勢力進一步侵入農村創造條件。按照卜凱的說法，技術改良不是用來發展農業生產而其目的只是在謀求最大限度的利潤收入。他說：“農民之興趣恆能在獲得最大之利潤，而不在講求每畝或牲畜最高之產量。農業研究着重生產量之增加實不可勝計，然最大利潤之獲得並不一定由於最高之生產量也。”（卜凱、中國農場管理學，第 54 頁）他又說：“對於農事不甚熟悉之若干人士每不了解農業最有利之生產常處於一狹窄限度之內，由於此種誤解，此輩人士恆作不實際之建議而勸告農人增加產量。”（卜凱，中國農場管理學，第 66 頁）試問為何增加生產不能增加利潤呢，卜凱認為增加生產是有限度的，這個限度可分為自然和經濟兩方面，自然限度中最重要的是氣候，“氣候一項恆為最主要的因素，但農民對之甚鮮控制之能力”，“經濟限度即通常所謂‘報酬遞減之點’，‘各種生產因子如土地、人工、種籽、肥料、及農具等之使用均可證明此種現象。”（卜凱，中國農場管理學，第 67 頁）因此，增加生產超過這“狹仄的極限”便將導至成本增加、利潤減低。資產階級荒謬的所謂“土地收益遞減律”根本不是什麼“規律”，這一點已為許多人所批判，和被無數的實例加以駁倒，這裏就不再在這一方面多談了。就簡單地看眼前事實，解放以來，我國氣候條件並沒有改變，但農業生產迅速增加，農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具體事實正有力地駁斥了卜凱的這些反動謬論。

還必須指出，卜凱和他的主子的本意並不願意我國農業生產發展起來的，為了華爾

街的財閥的利益，他們很希望中國的農業始終停留於落後狀態，好讓大批的美棉、洋米、洋麥向中國傾銷來獲取高額利潤，例如我國 1930 年棉花進口曾達 4,180,906 担，1933 年小麥進口達 21,429,238 担，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從美國輸入的。

寫到這裏，不禁想起一位過去所謂“農業經濟學者”，死心踏地的維護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忠臣”董時進來，（49 年全國已基本解放，他還“上書”反對土地改革），他的言論幾乎和卜凱如出一轍，他也提出所謂“獲利”問題，“出一担穀之地出二担穀困難，一元錢之地出二元錢容易”，他認為“多出錢”的途徑是種植“價值較大的特產”，“發展各種外銷特產”，他一再宣揚，“中國有糧食進口，不足為病，而且勿寧說是應當”，“糧食不能自給非恥辱”，一方面提倡發展殖民地的農業方向，為帝國主義原料服務，一方面把糧食這個命根子交到帝國主義手中，這就是帝國主義分子和帝國主義的“忠僕”共同的目的。另外，董時進對土地及佃農問題的看法，認為“一般佃農的境遇，並不如許多人所揣想之惡劣”。總之他和卜凱一模一樣，這就是因為他們反動立場相同的緣故。（以上引文見董時進著“中國農業政策”及“國防與農業”二書。）

由於卜凱的所謂技術改良僅是一個幌子，因之，在他的著作中，我們很難發現其中有任何具體的改良農業的辦法，相反的，占其著作的絕大部分是對我國農業的自然和經濟狀況的調查和統計、數字和表格、以及一些繁瑣的社會經濟數學化的計算公式與文字解釋。這些介紹情況性質的數字資料正是帝國主義政治和經濟勢力侵入中國農村所必須首先握掌的東西，亦正因為這樣，才有許多帝國主義機構如太平洋國際學會、洛氏基金團、美國財政部等肯出鉅資來支持這些調查研究工作，而這些調查研究的結果都用英文寫出，到外國去出版。

第四，卜凱對中國人口問題的荒謬論斷。卜凱在人口問題上，也就是對中國農村問題總的看法，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國農村的人口過多。卜凱當然不會承認我國封建的生產關係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而將我國農業生產技術落後的“最基本最主要之原因”歸咎於“耕地有限”和“農村人口過剩”。他荒謬地論斷我國由於農村人口過剩，以致造成“田場太小”、“耕作方法幼稚”、“效率低”、“不能使用機器”、“災荒頻仍”、“農民愚蠢無知”等等一系列的結果。舊中國農業生產技術落後，決不是像卜凱的那樣說法由於農村人口過剩，誰都知道是受了陳腐的生產關係底約束的結果；殘酷剝削的封建土地制度在舊農村裏構成了地主官僚買辦等反動統治階級對農民施行政治經濟壓迫的基礎，和帝國主義肆行侵略的憑藉，阻礙了中國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中國農業生產技術落後的真正原因就在於此。如果卜凱不敢正視舊中國封建半封建的土地關係與生產關係是束縛農業生產力向前發展的枷鎖的這一類問題，而把生產技術落後歸罪於人口過剩，這無疑的是一種極端污蔑的和反動的說法。

解放以來，我國農業生產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領導下普遍高漲，農民生活水平不斷

提高,到1967年全國主要不同地區的糧食生產,除掉某些例外,爭取每畝平均年產量分別達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要求,每人每年將有一千斤左右的糧食(以八億人口計算)。這說明了新的生產關係,即農業合作化給我國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最廣闊的道路,在個體經濟的條件下,這些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所以像卜凱、董時進等污蔑我國人口過多而阻礙了農業生產發展的說法是完全荒誕無稽別有作用的。

第五,卜凱的農村調查是為資產階級理論所指導和為剝削統治階級服務的。卜凱在進行調查統計時所採用的方法是十分不科學的,並有意以此為掩蓋剝削實質的作用,主要有這幾方面:

1. 卜凱在所採用的調查統計方法上充分地暴露出他的資產階級反動面貌。卜凱抹煞了農村中的封建剝削的生產關係,採用資本主義的一套調查統計方法來進行調查研究,是有他的反動的政治作用的。卜凱作為一個美國財閥的代表人物在我國進行盜竊經濟情報活動,是有着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卜凱當然不會站在被奴役被剝削的勞動農民的立場上來研究農村問題的,恰恰相反,他是千方百計地來掩蓋我國農村的真實情況,隱蔽階級矛盾、宣揚階級調和,目的是鞏固資產階級政權。

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說,社會經濟的過程與現象的特質也決定着社會經濟統計學應當採用哪一種方法,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統計在對象、任務、方法上絕不可能是相同的。即使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各種形態和現象時,也必須採用不同的方法。列寧指出:“農業的這些形態是受資本的驅使和任意改造,然而為了明瞭、評價、和以統計方式表現這些過程,就必須使問題的提法和研究方法,適應過程的各個不同的形態。”(列寧全集,卷22,第46—47頁)因此,調查統計方法是決定於被研究的社會經濟過程的性質,它們應當隨着各過程的形態的改變而改變,而卜凱則違反這一基本原則,採用適合資產階級利益的調查統計方法為剝削階級服務,所以說卜凱採用資本主義的一套調查統計方法是有他反動的政治作用。

2. 卜凱在求平均數的方法上是極不正確的、是違反科學平均法的理論的。因為要用平均數說明變動標識的那個總體必須是同質的,也就是說,統計上的科學平均法是建立在分組法的基礎上,利用分組法區別開同質總體,然後才能求平均數,而不是對一切總體都籠統地利用平均特徵。卜凱則違反科學的平均數方法論,把不同階級的經營地主、富農、中農、貧農混合在一起,作出完全虛構的“平均”數字來,這種虛構的數字不但不能反映出農民生活的真實情況,並且從而掩蓋了階級矛盾。我們知道,利用平均數必須在一定時間內才可以表明大量現象的典型特點,而卜凱在中國農家經濟一書中所用的調查材料前後相距四年有餘,在漫長四年多的時期內,各調查地點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一定有了許多變化,而竟被卜凱一手壓成平面,抹煞了各種因素遞變的真相。

3. 卜凱的統計方法是與實用主義異途同歸的。他根據片面的現實“尊重事實”，羅列若干事例，企圖反映一部分的現實現象，但却不能構成能論證的充分根據。從表面看來似乎有些事例為根據，但他看到的只是片面的現實，只看到農民辛勤勞動的成果，沒有看到地主殘酷的剝削，只看到生產力，沒有看到物質生產中的生產關係。如果忽視了基本的全面的現實，而只根據片面的，支離破碎的現實，那是不可能得出任何正確論斷的。列寧早已指出：“抽取個別事實，玩弄事例，是適用在社會現象方面最流行同時也是最不可靠的方法。單單搜集事例固屬不費什麼事，但這是沒有多大意義，沒有多大用途的，因為一切真象是存在於個別事實的歷史具體情況中。一個事實，如果不是從整體中，不是從其相互聯系中抽取出來的，如果他們是支離破裂的東西，則它們無非僅是一種玩物或較玩物更壞的東西而已。”（列寧全集，卷30，第303—304頁）無疑的，卜凱的一套統計方法是沒有科學基礎的，所以在他的全部著作中也就不可能得出符合事實真相的結論來。

總之，舊中國農業危機產生的基本原因，就是社會結構中存在的基本矛盾，即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產關係阻礙了農業生產力發展，並已起了嚴重的破壞作用，不變革這種生產關係，農業不可能得到發展。但是，反動統治階級是不甘心於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然而深刻化的農業危機，國民經濟的破產，以及產生在全國範圍內的農民暴動等，已直接動搖到它的統治。因此，“復興農業”、“災區善後”、“農業合作”、“農業貸款”等等一系列的騙人的勾當不斷提出。與之同時，和國民黨反動派相呼應的，實質上是相勾結的“鄉村建設”、“平民教育”、“農村復興”、“農業技術改良”諸如此類的倡議，風起雲湧，瀰漫全國，形形色色，有反動的理論，有實際的活動，但儘管派別衆多，其間有多少小的區別，或他們自以為有差別，却有一個集中體現，便是都在肯定“現存社會制度”的前提之下，在不改變“現實的生產關係”底範圍之內，僅為對抗或緩和“反帝國主義的運動”而出現的一串以“和平”的“漸進”的合法手段，進行一點一滴的“改良工作”及“建設運動”，而企圖中國農村底“復興”。（范郁文，中國農村運動的回顧及展望，轉引自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三輯，第938頁）所以他們都是站在反動政權一方面，為封建地主階級、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服務的。他們的區別只是有的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勾結依靠帝國主義；有的站在買辦資產階級的立場，代表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並勾結封建地主階級；而一小撮帝國主義分子則直接參加許多危害活動。卜凱在中國一系列危害活動，如果說和其他農村改良運動形式上有些差別的話，就因為他在表現手法上有一主要特點，即隱蔽性和迷惑性頗強，也就是最毒辣的地方。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他長期以金陵大學為據點，在“教育”“學術”的幌子下，傳佈毒素，正好利用許多中國師生作他的工具，到各地農村蒐集資料。有一階段，筆者也受其迷惑，被他所利用，這是一件對人民負疚、非常痛心的事。卜凱的反動本質在

我國還沒有得到徹底的揭露和批判,農業經濟學者特別是從舊社會來的,爲使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爲理論基礎的農業經濟科學得到發展與繁榮,對於撲滅及防止反動的謬論侵襲,清除美帝分子卜凱過去對我國農業經濟科學沾污,對之作徹底的揭露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因限於篇幅和筆者的理論水平,可能某些地方不够深入或者某些地方甚至有錯誤,希讀者指正。

A CRITICISM TO J. L. BUCK'S TECHNICAL REFORMISM

L. K. Y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o criticize J. Lossing Buck who had lived in China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1920—1944) and taken advantage of the professorship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to collect all sorts of economic materials for the American capitalists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oppress the Chinese people both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Moreover, he had helped the reactionary Kuo-Min-Tang government to strengthen its ruling power over the Chinese peasants. Buck, therefore, was and is still the real enemy to us.

Under the mask of an economist, Buck has always been pretended to be friend to the Chinese peasants, but in fact he spread all sorts of bourgeoisie theory in order to harmonize the class struggle between the peasants and the landlords. This article criticizes his theory on the following points:

1. Buck's viewpoint concerning the land problem;
2. His viewpoint concerning the family-sized farm;
3. What he really thought about the agricultural reformation in China;
4. His reactionary idea concerning the Chinese farm population problem;
5. His research method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bourgeoisie economics and is only beneficial to the ruling class.